

美麗的鄉愁，永遠的家國

——讀席慕容《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

青年讀書會

提起席慕容，很多如我一樣步入中年的讀者，腦海裏的第一反應就是：純淨恬淡的散文篇章和清新熱烈的愛情詩句。這並不奇怪，以《一棵開花的樹》、《白色山茶花》、《七里香》等為代表的作品，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於兩岸四地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陪伴了幾代人的成長。那個時候，席慕容也不過是三十歲的青年。如今，她已經七十七歲了。可不論在怎樣的年紀，作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少數民族作家，她都於作品之中，熱情地謳歌美麗的鄉愁，表達着對家國情懷的追求，始終如一，未曾改變分毫。



趙 陽

《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是席慕容在年近古稀之時出版的又一本散文集。她在作品裏既不斷追憶着故國，更對本民族進行持續的文化尋根。她虛擬出一位同族少年，用「給海日汗的21封信」，殷殷講述屬於一個群族的歷史和現狀。海日汗是作者想像出來的人物，是預先給自己設定的訴說物件，他是一個生長在內蒙古的蒙古少年，她給這個孩子

取名海日汗。

深層思考遊牧文化本質

從海日汗的視角出發，席慕容將蒙古文化的方方面面娓娓道來：蒙古及蒙古高原其他遊牧民族歷史文化「像詩句一樣悠長」「像陶瓷的紋理那樣厚重」，那蒙古高原的自然環境「像是彩色的水筆在編織在描繪」，許多歷史真相



需要後來人深入地探究，於是她期盼着「海日汗，勇敢而智慧的海日汗，要尋找那民族之根與魂」。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席慕容對於遊牧文化本質做了深層意義的思考。

從年輕的女詩人，到走向人生更為厚重時期的女作家，席慕容的創作張力不論從內容還是表達技巧都達到了更為高超的境界。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

人，席慕容一九四三年出生於重慶，她少時處在動盪不安的戰亂年代，一直顛沛流離，隨父母輾轉重慶、上海、南京，最後到了台灣。作為一個永遠的轉學生，那種「站在門外」和不被接納感，讓年少的席慕容產生了深深的孤獨感。在四十六歲那年，席慕容第一次登上蒙古高原。

在一次演講中，席慕容說：「剛回來的時候，我以為我來看我父親母親的故鄉，後來我發現，我是來看我的族群的故鄉。最後我發現，那是整個遊牧文化的幾千年的累積，其實我也是它的一部分。」席慕容認為這是因為「身體裏面住着一個還對從前的那個她自己的記憶念念不忘的靈魂」。或許也正是因為這種念念不忘的追尋，才讓她在七十歲的高齡寫出了《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裏的文章。

家國情懷成就了席慕容

美麗的鄉愁背後，是一個有歷史責任的女作家深深的家國情懷。也正是這

樣的家國情懷，成就了席慕容的人生書寫。以至於「從自己的小小鄉愁裏走出來，往周邊更大的範圍裏去觀望去體會」，在往各個方向都去探尋過之後，在這本書裏又轉過身來，重新面對自己家族在此生長繁衍的山河大地。我想，她筆下對於「一個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對當下香港的年輕一代有着深刻的現實啟迪，不妨抄錄如下：

「我終於來到在書冊裏翻尋過無數次的薩拉烏素河的河邊了，驚喜過後，心中湧出的卻是一種無邊的安靜與滿足，好像在我周遭的景物，包括河面上每一寸細碎的波光，河岸上每一株小草的柔嫩多汁，林間每一陣微風穿過之後葉片的顫動，所有的光影、色面與線條的變幻，都在同時緩慢而又銳利地進入了我的身心，彷彿是輕輕的觸動，卻又留下了極為繁複與細微的刻痕……一切似曾相識。海日汗，我想，應該就是這樣的刻痕，一日復一日地讓我逐漸長成為一個我所希望能夠成為的人——一個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

彌足珍貴的童心

楊劍威

世界上最寶貴的是什麼？也許就是童心未泯。

1983年中國大陸拍攝的《城南舊事》根據台灣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說改編，是一部非常難得的好電影。深情而含蓄、悠長而緩慢。飾演小女孩林英子的沈潔當年還是上海大連路小學的一名學生。她純淨的眸子、天真的微笑、似懂非懂的表情，把一個孩子的純真表現得真實而可愛。

那是個風雲變幻、起伏動盪的北京南城，普通百姓的命運在不同軌跡，以一種貌似平淡卻深為悲涼的方式展開：祥林嫂一樣的秀珍因為失去愛人和小孩而精神失常、小夥伴妞兒因不是父母親生而常被虐待、為了供弟弟讀書的小偷最終被捕、子女被販賣的女傭宋媽只能對自己的命運默默流淚、而父親的驟然去世，讓英子幸福的童年隨之瞬間消逝了……

《城南舊事》展現的是大時代下平民百姓的悲苦，卻沒有一絲對所謂舊制度舊社會的血淚控訴。在一個小學女童的眼睛裏，完全沒有那種激動的情緒，所有的人都很善良，無論是小偷、瘋子還是保姆，在黑暗的縫隙裏總能投射出一道光明，閃爍人性的光輝。

信仰童心的豐子愷，認為兒童的本質便是藝術。他曾說：「教養孩子的方法很簡單。教養孩子，只要教他永遠做孩子，即永遠不使失卻其孩子之心。」孩子之心，童心，我想就是一顆單純、善良、質樸、真誠的心吧！現在的

教育，很多人都把孩子培養成人精，除了各種補習課外對智商的培養，還有高級的情商培養，練就世故與圓滑，以應付未來激烈的社會競爭。而在物質主義的潮流下，攀比和炫富，污染了純真的童年時代。雖然可憐天下父母心，但是孩子們過早地失去童心，還是非常可惜的，因為一旦失去，恐難再得。

成人的世界裏有沒有童心呢？當然是有的，除了瘋子，還有一些傑出的文學家。我暫時能想起來的有沈從文和南唐後主李煜。

沈從文在湘西鳳凰古城的墓地簡樸、寧靜，墓碑是一大塊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從文的手跡，分行鐫刻着《抽象的抒情》中的題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面是夫人張兆和撰書「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晚清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評論南唐最後一位君主李煜：「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在政治上的失敗帝王，卻可以吟詠出流芳千古的詩句。看來無帝王心，無萬世功名；無童心，無文學巨匠。兩者兼而有之者，未曾念及。

遠山望海，居家隔離終於結束了。朋友圈也都是登山遠眺、踏青迎春的美圖。出門放風前，忽然又想起來，難道只有人文領域的天才會有童心嗎？愛因斯坦那張調皮的照片浮現腦海。也許在追求純粹學問的旅途上，不乏其人吧！

慳吝鬼胡三公子

王誦詩

《儒林外史》第五回末尾和第六回開頭，描寫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手指頭不肯斷氣，幾個侄兒和家人亂猜一通，嚴監生只管搖頭不是，填房趙氏知道自己男人的心思，挑掉燈盞裏兩莖燈草其中一莖，省了燈油，嚴監生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據此，有人斷言吳敬梓描寫的是一個慳吝鬼守財奴的形象，我卻不以為然。故事中嚴監生的哥哥嚴貢生攤了官司，嚴監生膽小怕事，捨得花大把銀子，各處協調打點，替哥哥了卻官司。妻子王氏病危時，嚴監生假借妻子的名義，拿出兩封銀子，每封一百兩，分別送給王德、王仁二位老舅。這難道是一個慳吝鬼的形象麼？

說到慳吝鬼，不妨看看《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吳敬梓描寫胡尚書家三公子（名縝，字密之）慳吝的嘴臉，形神畢肖，十分精彩。杭州幾個文人雅士一天到西湖花港，倚着胡三公子去借花園吃酒，一人關着門就是不肯。景蘭江背地裏問原因，那人一語道破：「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

的大老倌鄉紳，我不奉承他！」

胡三公子遂拉着景蘭江去街上買酒食。先到一家鴨子店，胡三公子怕鴨子不肥，拔出耳挖子，戳戳鴨子脯子上肉的厚度，這才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又到饅頭店，要買三十個饅頭，那饅頭三個錢一個，胡三公子只給兩個錢一個，店主不願意，兩個人吵了起來，景蘭江在旁邊勸架，也沒有用，乾脆不買饅頭了。買了一些下酒之物，回來之後，胡三公子交給和尚收拾打理，支劍鋒感到很奇怪，就問：「三老爺，你何不叫個廚役伺候，為什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廚役就費了！」

鬧騰到晚上，詩會宴集結束，胡三公子叫家人收拾餐桌，拿來食盒，把剩飯殘菜骨頭骨腦全都裝在裏面。臨走，果然又盤查和尚，還剩了幾升米，也裝進了食盒。胡三公子押着家人挑着食盒，回城去了。

以上幾個細節描寫，力透紙背，活脫脫刻畫出胡三公子一副慳吝鬼的形象，令人啞然失笑。這胡三公子是胡尚書家三公子。尚書公遺留宦囊不少，這個公子卻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這樣一個家底豐厚的豪門公子，錙銖必較，連吃剩的一點骨頭也不放過，嚴監生豈能和他同日而語？

我們還有愛？！從《悲慘世界》想到今天香港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東吳一劍

近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多些時間在家重溫幾本經典名著，其中法國文豪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深深吸引了我，主人翁冉阿讓（Jean Valjean）身上那種至高無上的博愛精神，他偉大的人性的巨大力量。聯想當前香港社會存在的問題，不禁想問：我們可還有愛？！

在雨果筆下那個無情的資本主義社會，冉阿讓是因為主教的寬大和仁慈深深地被改變。在書中，出獄後的冉阿讓背負着囚犯的身份，飽受着他人的歧視。社會的不公與排斥，一點點的磨滅了他重新做人的希望，改過向善的信心。是慈悲為懷的主教伸出慷慨的、無私的援助之手，收容了走投無路的冉阿讓，他不僅不計較冉阿讓偷他的銀器皿，反而將那一對銀製的燭台送給了他並叮囑道：答應我一定要把這些錢用到好的地方，把這些銀器賣

掉，用這些錢讓自己過得好一些。在主教的感化下，冉阿讓重新燃起了心中那快燃滅的希望之火，讓他徹底悔悟，開始了新的生活。冉阿讓開始變得樂於助人，見義勇為得到人民的愛戴，並慢慢成為了受人尊敬的市長。從囚犯到市長，簡直是天壤之別，這無疑是人性的巨大轉變。

改變人的最大力量就是「愛」！每個人都有愛，但有的人只愛自己，愛自己的親人，愛自己所擁有的。冉阿讓的愛卻是給世上所有可憐的人、貧窮的人、值得同情的人、值得尊敬的人，近似與我們中國儒家所言的「仁愛」。

是什麼力量促使冉阿讓對那麼多毫無血緣關係的人，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愛呢？因為他已經把這個世上所有貧苦、可憐的人都看作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以父親的義務和

責任去照顧每一個子民，這種愛才是至高無上的。

今天的香港，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為了自己私利，不擇手段濫用職權，要犧牲所有香港人的福祉。他們眼中，除了自己便無別人，看不到香港有好多市民的生計因黑色暴力與新冠疫情而備受威脅，而他們，自命是「社會的精英」，為了自己無休止的私欲，不惜發動「攬炒」，讓整個社會為他們的理想陪葬！

或者再講「獅子山精神」已經太老套，但每個香港人都應該嚴肅去想一想「攬炒」這件事，相比起「仁愛」，「攬炒」會給讓社會更美好嗎？如果我們還有愛，無論是儒家的仁愛，還是聖經中上帝的博愛，如果我們的社會還記得愛，逆境自強，守望相助，香港才有機會走出困境，重放東方之珠的光芒。

擇友讀書與謙抑知命——讀《父子宰相家訓》

溫 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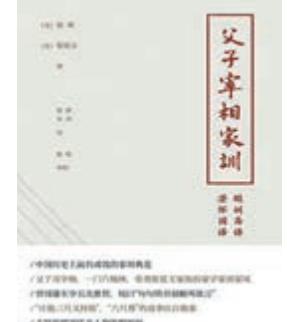
《父子宰相家訓》是清代父子兩代名臣張英、張廷玉所作的家訓，分為《聰訓齋語》和《澄懷園語》兩篇。父子二人兩代為相，「父子雙學士，老小二宰相」是中國歷史上的美談。

古人家訓的主要讀者是族中子弟，對於子弟的教育是全書的核心。筆者認為張英父子的教育理念的核心便是謹慎擇友，培養情趣。

首先是擇友：「友不擇便交」，父子兩人歷練多年，見過太多世家子弟，因為擇友不慎，與一幫自詡名流者只顧吃喝玩樂，高談闊論，卻荒廢學業乃至於家業衰敗。因此家訓中特別提醒子弟切忌結交損友，「棄幼學之功，貽終身之累，蓋覆轍相踵也」。提倡子弟不若「珍重難得之歲月，縱讀難得之詩書，快對難得之山水」。

「擇交者不敗」，離損友需交益友。何為益友？家訓中也提到：「德性謹厚，好讀書者」，熱愛讀書，性格厚重的朋友，雖二三人亦足矣。酒肉朋友縱使前呼後擁，也只能是「狎無益之友，聽無益之談」。

家訓中也不忘強調生活情趣。生活情趣首推讀書：「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不讀書的人，生活中稍遇不順，便覺世間唯我獨坎坷。



官場中人，鳶飛戾天本是正常現象。但張英父子身居高位，卻反而告誡自己的子弟要「知命」。張英更是以自己在吏部任職的親身經歷舉例：「每見人之數應為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干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失之」，告誡子弟窮通得失，皆有定數。

如果一心爭競，則可能求得反失，求速反遲。既然天命既定不可為，不如以平常心看待得失榮辱，以造福子孫。張英長子張廷瓊甚至在山東主持科舉考試時，以「不知命」為題目，可見其影響之深。

清代至乾隆年間，漢族大學士不過數十人，其中就包括張英父子。其中兒子張廷玉更是能夠作為唯一漢族官員，配享清朝太廟。其人能獲此殊榮，也與張家這種「謙抑」「知命」的思想分不開。